

# 人是情感的存在

蒙培元先生80寿辰学术研讨集

黄玉顺

杨永明

任文利

主编

北京大学出版社  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

# 人是情感的存在

蒙培元先生80寿辰学术研讨集

黄玉顺 杨永明 任文利 主编

北京大学出版社  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人是情感的存在:蒙培元先生 80 寿辰学术研讨集/黄玉顺,杨永明,任文利主编. —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8. 3

ISBN 978 - 7 - 301 - 29143 - 6

I. ①人… II. ①黄… ②杨… ③任… III. ①蒙培元—哲学思想—文集  
IV. ①B262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328886 号

- 书 名** 人是情感的存在——蒙培元先生 80 寿辰学术研讨集  
REN SHI QINGGAN DE CUNZAI
- 著作责任者** 黄玉顺 杨永明 任文利 主编
- 责任编辑** 魏冬峰
- 标准书号** ISBN 978 - 7 - 301 - 29143 - 6
- 出版发行** 北京大学出版社
- 地 址**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
- 网 址** <http://www.pup.cn> 新浪微博:@北京大学出版社
- 电子信箱** weidf02@sina.com
- 电 话**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
- 印 刷 者**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- 经 销 者** 新华书店
- 650 毫米×980 毫米 16 开本 26.75 印张 385 千字  
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- 定 价** 78.00 元

---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**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**

举报电话:010-62752024 电子信箱:fd@pup.pku.edu.cn

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部联系,电话:010-62756370

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资助

## 序 言

这个文集的编撰,是为了庆贺当代著名哲学家、中国哲学史家、儒学大家蒙培元先生 80 寿辰。蒙先生于夏历戊寅年正月初十(1938 年 2 月 9 日)出生于甘肃省庄浪县;①今年是夏历丁酉年,正月初十(2017 年 2 月 6 日)是蒙先生虚岁 80 周岁,即传统所称的“耄寿”。②

蒙先生 1963 年开始在著名中国哲学家、现代新儒家冯友兰先生门下做研究生,1966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;1980 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从事中国哲学研究,历任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,研究生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,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,《中国哲学史》杂志主编,美国哥伦比亚大学、哈佛大学访问教授,台湾“中央研究院”文哲所访问教授,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等;著有《理学的演变》《理学范畴系统》《中国心性论》《中国哲学主体思维》《心灵超越与境界》《情感与理性》《人与自然——中国哲学生态观》《蒙培元讲孔子》《蒙培元讲孟子》《朱熹哲学十论》等。

蒙先生的哲学思想,是对冯先生“新理学”的“接着讲”,并加以发展与转化,提出了“人是情感的存在”③、儒家哲学乃是“情感哲学”④等一系

---

① 这里的出生日期是以蒙培元先生的身份证为准。另有一说:蒙先生的实际出生日期是 1937 年 1 月 30 日,即夏历丙子年腊月十八。

② 所谓“虚岁”,按中国传统干支纪年法,则为实岁;自戊寅年(1938 年)至丁丑年(1997 年)实满一个花甲六十周岁;至丁酉年(2017 年)实满八十周岁。

③ 蒙培元:《人是情感的存在——儒家哲学再阐释》,《社会科学战线》2003 年第 2 期。

④ 蒙培元:《情感与理性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,第 310 页。

列重要命题,从而独树一帜地建构了“情感儒学”<sup>①</sup>,并将这种根本思想贯彻于心灵哲学、生态哲学、儒学史、中国哲学史等研究领域之中。蒙先生的“情感儒学”,可谓是两千年来儒家思想之大翻转,即一反孔孟之后皇权帝国时代儒学的“性→情”架构,回归孔孟的情感观念,重新确立了仁爱情感的本源地位。因此,蒙先生不仅是杰出的儒学史家、中国哲学史家,更是杰出的儒学家、哲学家。

这个文集收录的文章,有些是已经发表过的,多数是新撰写的,分为八编:(一)蒙培元哲学思想总论;(二)蒙培元“情感儒学”研究;(三)蒙培元“生态儒学”研究;(四)蒙培元哲学思想比较研究;(五)蒙培元哲学思想其他专题研究;(六)蒙培元哲学思想之继承与发展;(七)访谈;(八)附录。通过这些文字,读者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蒙先生的为人与为学,必将对儒学与中国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大有帮助。

黄玉顺 序于2017年5月

---

<sup>①</sup> 崔发展:《儒家形而上学的颠覆——评蒙培元的“情感儒学”》,《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化》,易小明主编,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;收入《情与理:“情感儒学”与“新理学”研究——蒙培元先生70寿辰学术研讨集》,黄玉顺等主编,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。另参见黄玉顺:《情与理:“情感儒学”与“新理学”研究》序言《存在·情感·境界——对蒙培元思想的解读》。

# 目 录

序 言 黄玉顺 / 1

## 第一编 蒙培元哲学思想总论

蒙培元先生哲学思想概述 任文利 / 3

中国哲学的“蒙式话语”

——蒙培元先生中国哲学研究述评 张斯珉 乔清举 / 17

究天人之际,成一家之言

——蒙培元学术思想评介 何 晓 / 33

## 第二编 蒙培元“情感儒学”研究

比较哲学视野下的中国哲学的情本主义 张再林 / 45

情感儒学与儒学史三阶段分期新说 宋大琦 / 59

无处“安放”的儒者情怀

——蒙培元“情感儒学”印象 蔡祥元 / 72

自由与情感

——现代性危机背景下的蒙培元情感哲学之思 崔 罡 / 80

## 第三编 蒙培元“生态儒学”研究

境界与生态:儒家哲学的终极关怀

——读蒙培元《人与自然——中国哲学生态观》 丁为祥 / 121

中国古代哲学是生态哲学

——蒙培元先生的生态哲学观 余谋昌 / 142

《易传》三才之道的环境伦理学省察

——以蒙培元对儒家生态哲学的诠释为线索 张 新 / 149

主体性的转变:由认识主体到德性主体

——蒙培元先生生态哲学思想探析 何 晓 / 161

## 第四编 蒙培元哲学思想比较研究

问题意识与接着讲

——以冯友兰先生和蒙培元先生对阳明学的不同诠释为中心  
何善蒙 / 173

西方遇见东方

——斯洛特、蒙培元情感价值体系比较 李高阳 / 188  
关于“情感儒学”与“情本论”的一段公案 黄玉顺 / 200

## 第五编 蒙培元哲学思想其他专题研究

略评蒙培元先生对中国哲学

主体思维的揭示 郭 沂 / 207

世界的“返魅”

——蒙培元先生的儒学自然宗教观 任文利 / 214

走下神坛的圣人

——蒙培元先生心目中的孔子 李峻岭 / 227

心性不二的实现历程

——评蒙培元先生的中国佛学研究 杨 虎 / 232



## 第六编 蒙培元哲学思想之继承与发展

- 儒教作为“国民宗教”的向度考察 任文利 / 247
- “性焉安焉”与“复焉执焉”  
——周子“中正仁义”二重进路 朱雪芳 / 265
- 礼法体系视野下的中国传统法哲学  
范畴体系及其现代转型 宋大琦 / 270
- 生活儒学与中国正义论  
——从我研究儒学说起 黄玉顺 / 285
- 修身儒学 孙铁骑 / 298
- “自由儒学”导论  
——面对自由问题本身的儒家哲学建构 郭 萍 / 313
- “心灵儒学”导论  
——儒家心灵哲学的新开展 李海超 / 334
- 悲悯哲学导论 杨 虎 / 35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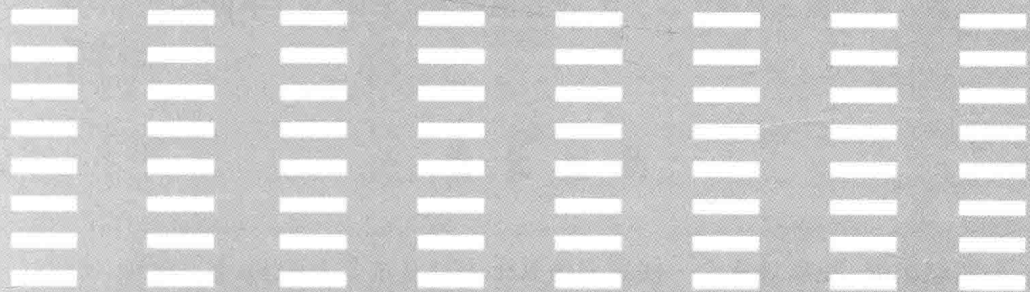
## 第七编 访 谈

- 情感与自由  
——蒙培元先生访谈录 蒙培元 郭 萍 / 387

## 第八编 附 录

- 蒙培元先生著述总目 任文利 编 / 397
- 蒙培元哲学思想研究总目 黄玉顺 编 / 411

第一编 蒙培元哲学  
思想总论





# 蒙培元先生哲学思想概述\*

任文利

蒙培元,1938年生,甘肃庄浪人。哲学家,中国哲学史家。长期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,任研究生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,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,《中国哲学史》杂志主编、顾问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、哈佛大学、台湾“中央研究院”文哲所访问教授,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。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、中国哲学理论研究。出版专著10余部,发表论文200余篇。代表作有《理学的演变》《理学范畴系统》《中国哲学主体思维》《中国心性论》《心灵超越与境界》《情感与理性》《人与自然》与《朱熹哲学十论》等。其中,《理学范畴系统》《中国心性论》《中国哲学主体思维》等专著均被译为韩文在韩国出版。蒙培元立足于中国哲学所特有的问题意识,力图突破中国哲学学科成立以来,以西释中的解释范式,在中西会通的视界中,彰显中国哲学的固有精神实质,对于儒家情感哲学、生态哲学都有独到而深入的思想发掘。

## 一、成长经历

蒙培元于1938年2月9日生于甘肃庄浪的一个农村家庭,兄弟姊妹五人,排行老三。上有二位兄长,下有一弟一妹。祖父是清朝末年的贡

---

\* 本文原载:《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·哲学卷》第三分册,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。原题为《蒙培元》。

生,在县里设塾讲学,民国初年,曾任庄浪县女子学校第一任校长。父亲是一位读书人,毕业于兰州优级师范学校,曾在县中学里教国文课。母亲出身于有一定文化背景的家庭。父亲为人耿介,因得罪了当权者而丢了中学的教职,到附近乡村的一所私塾里教书。他八岁始开始随父亲到私塾里去念书,但诵读的不是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等蒙学之书,也不是“四书五经”之类的儒家经典,而是一些古典文学散文和历史一类的书,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对古书的兴趣,开始翻阅家里留存的一些线装书,隐约中希望做一个有学问的人。

蒙培元进入小学是直接从四年级读起的,在所有的课程中最喜欢近于游戏的数学。进入初中,语文、历史、地理之类的课程使他获取不少人文方面的知识。高中时,教育体制和要求明显地发生了变化,理科成为主课,占了优势,而文科成为副课。在这种情况下,他也以理科为主攻方向,高考时也选择了理科,1957年被北京大学录取。1958年,由于色弱的原由,不适合学习地质学,转至哲学系。

他是带着对北京大学、对蔡元培的憧憬进入北京大学的,众所周知,入学之始,迎来的“反右”“大跃进”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,哲学系所受到的冲击也最大。到了“三年困难时期”,倒是能坐下来读些书了,但是,课堂上讲授的,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。郑忻、冯友兰等知名教授的课,凡是能选的课,他都尝试去选听,但也没有听出多少哲学思想。郑忻在课堂上要么是在讲康德之前,先对康德进行批判,要么就是痛哭流涕地自我批判。即使是冯友兰撰写的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(正式出版后改名《新编试稿》),也要表明是在“脱胎换骨”之后写成的。这就是说,无论西方哲学还是中国哲学,都只能在“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”这一公式下讲授与写作。

在这样有限的读书学习过程中,蒙培元对哲学有了一点粗浅的了解。对西方哲学史,产生了兴趣,觉得里边不仅有思辨的理论知识,还有很强的逻辑推论的方法。中国哲学则让他感觉更亲切、更有情趣,这与他从小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有关系。他最终选择了中国哲学史作为主攻方向,冯友兰的影响是很大的。1963年本科毕业,他选择报考冯友兰的研究生,

被录取。

冯友兰教育学生,学习期间就是如何“打基础”“练基本功”,以及如何“扫清拦路虎”,学好外语和古汉语。并列出一个读书计划,从古到今一长串读书目录。冯友兰强调,在读古书时,先不是批判,而是读懂,要站在古人的立场,“优游涵泳”理解古人的意思,理解之后再批判,这实际上就是“同情的理解”。同时强调要随时了解学术动态,了解学术研究的状况及其进展,全面了解别人的研究成果,做到“心中有数”。于是,蒙培元进入了研究生三年“打基础”的学习生活,比较系统地读了一些书。

1966年毕业,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,未予分配,蒙培元在思想上也陷入了完全的迷茫。1968年,他被分配到天津教中学,被工宣队称为“修正主义苗子”,一面教书,一面接受改造。但他始终不愿意放弃所热爱的专业,决心重新回到中国哲学、文化的精神世界,白天给学生上课,晚上就一本书一本书地从头读起,书不够,就到市图书馆去借。就这样一直坚持了整整十年,从未间断,并从中找到了乐趣,也为日后从事学术研究真正打下坚实的基础。于远离学术的地方,如一叶孤舟,在风雨中飘摇。在那个中国文化受到全面摧残的时代,他依然对它心存敬意,情有独钟,并且相信,它不可能被彻底打倒。

这时候,蒙培元已在北京成家,直至1979年后,方得以由津返京。起初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工作,第二年(1980年),转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,得以专心从事学术研究。此时,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,所谓开放,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开放,首先是观念的开放、思想的解放,这对搞研究的人来说,尤其重要。随着学术交流的进一步开展,港台和海外新儒家的著作在大陆也能够看到了,蒙培元用极大热情读了他们的著作,开拓了研究视野。

在不断扩展研究视野的这样一个过程中,蒙培元逐渐形成了一个想法,就是既要了解西方哲学,又不能依傍西方哲学;既要相互比较,又不能相互比附;既要相互吸收,又不能相互替代。哲学中既有普遍性的问题,又有特殊性的问题。所谓普遍性的问题,是在不同民族、不同文化的特殊境遇中形成的,是有不同的提问方式和解决方法的,是用不同的语言表述

的,这就是所谓多元化。研究中国哲学,首先要在比较的视野中揭示中国哲学的特殊的义涵和价值。前辈学者的贡献在于使中国哲学走进近代化、现代化,能够与西方哲学进行对话。但是,他们留给我们的任务也在这里,即我们如何摆脱西方哲学的影子,走出自己的发展道路?学术研究的生命力在于创新,在于标新立异,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而言之有据。

基于这样的认识,蒙培元于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他研究宋明理学的代表作《理学的演变》和《理学范畴系统》。《理学的演变》对理学历史做出了不同于传统的解读,特别是在朱熹理学与阳明心学的关系问题上,提出新解。该书奠定了他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。此后,蒙培元转入中国哲学本具的问题的思考,将研究视野集中于心灵哲学这一领域,《中国心性论》《中国哲学主体思维》《心灵超越与境界》《情感与理性》等著作,都是从不同侧面对相关问题的思考。生态哲学,则是蒙培元关切的另一个领域,《自然与人》即为此而作。其中既有对于中国哲学观念的理解,也有强烈的现实关切。

2002年,蒙培元于哲学所退休。退休后仍密切关注学术研究动态,敏锐地捕捉着哲学领域相关问题,思考、笔耕不辍,《朱熹哲学十论》等专著,都是于退休之后出版的。只要身体条件允许,他的这种思考就会一直进行下去。

## 二、主要研究领域和学术成就

蒙培元是一个哲学家,也是一个中国哲学史家。哲学思考离不开对哲学史相关问题的梳理,蒙培元对理学涉猎尤多,早期的《理学的演变》《理学范畴系统》,近年的《朱熹哲学十论》,是他在理学研究领域的代表作。前两者是对理学学派历史与理论体系的梳理,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。后者虽然是一个理学家的个案研究,却是以一个哲学家的视角,回到朱熹,对于古今、中西哲学的永恒话题,给出自己的理解。蒙培元始终在中西比较的视域中思考相关哲学问题,他提出中国哲学是境界形态的,而非实体论的。中国哲学的核心在于心灵哲学,心灵的核心问题是情感与理

性的问题,二者在中国哲学这里是统一的。他既对哲学的理论问题有独到的理解,同时,也有强烈的现实关怀。中国哲学生态观相关问题的探讨,就是莫基于这一现实关怀之上的。

### (一) 宋明理学的思想梳理

《理学的演变》是蒙培元的第一部专著,是对于朱熹后理学历史演变的梳理。中国古代哲学成熟于宋明理学,对于理学研究而言,朱熹与王阳明是关键。当时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,理学分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两大派,区分的根据是,程朱派主张“性即理”,陆王派主张“心即理”。按照前一说,理只能“具”于心而为性,但心并不是性,不是理;按照后一说,心便是性,便是理。前者以理为本体,后者以心为本体。被称为“新理学”代表的冯友兰,被称为“新心学”代表的牟宗三,对此均无异议。

蒙培元以为,朱熹确实主张“性即理”,而理是最高本体,可称之为理本论。但是朱熹也有明显的心学思想。这不仅是因为,朱熹很重视心的问题,对“心”有很多论述,而且因为,朱熹明确提出心本体的思想。这正是判定朱熹有心学思想的主要根据。朱熹不仅有“心具理说”,而且有源自程颐的“心体用说”,即以心之本体为性为理,而以心之作用为情为知。这里所说的“心体”,不是形体、体段之意,而是本体的意思。从这里可以得出一个结论,从本体的意义上说,心就是性,就是理,这是毫无疑问的。朱熹的“心即太极”“唯心无对”之说,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。

根究前人所探讨的理学与心学的对立,蒙培元以为它是以西方的主、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宋明理学,即认为理是客观的、外在的,心是主观的、内在的,因此有客观与主观、他律与自律之分。但是在中国哲学与宋明理学中并没有这种明显的主客二分。理学的根本宗旨,是心物、内外合一之学,是性无内外、理无内外,亦即内外一理的天人合一之学。这才是中国哲学的特质所在,也是朱熹哲学的特质所在。

在《理学的演变》一书中,蒙培元指出,从理学发展历史的角度看,王阳明思想是从朱子学演变而来的,更确切地说,是朱子学分化的结果。从理学发展的内在脉络看,阳明心学是为了解决朱子学中如何实现“心与理



一”的内在矛盾而出现的。这对于以王阳明心学为直接源于陆九渊的传统说法是一个挑战,这种挑战是奠基于扎实的史料梳理之上的,体现了论者的学术工夫。该书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初,某些思想仍有时代的烙印。但它对于朱子后理学历史的梳理,至今仍有很高的学术价值。同时,他对于朱子学与阳明学关系提出的新见,也逐渐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接受。

如果说《理学的演变》是历史的纵向的研究,《理学范畴系统》则是对理学思想的横向研究。“范畴”是从西方哲学翻译过来的语言,有其自身的含义,中国哲学有没有西方哲学意义上的范畴?蒙培元认为,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,中国哲学也有自己的范畴。但是,在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,要非常慎重,要意识到中西哲学之间的区别。其最大的区别,就是由范畴及其关系所代表的思维方式的不同。因此,他不仅仅是去解释每个范畴的含义,而是要揭示各范畴之间的有机联系,从思维方式的角度说明中国哲学的本质特征,重点在范畴系统,而不是范畴本身。各个范畴都是在相互关系中存在的,并且形成一个有机系统,而不是一个个的孤立存在。这种联系正体现了中国哲学最基本的思维特征,即“天人合一”的整体思维,这与西方的分析思维有很大的区别。

该书分为理气篇、心性篇、知行篇、天人篇四部分,将几十对重要范畴分置其中进行讨论,各篇乃至每篇的各对范畴之间,都有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系。理气篇是讲所谓宇宙本体论的问题,但它又不能离开人的问题,它只是全部范畴系统中的一个基本前提,必须过渡到心性篇才算完成。而心性篇是讲人的问题的,关于人的问题的诸范畴处在全部范畴系统的中心地位,但它们又不是与理气篇诸范畴相互分离和对立的。知行篇范畴具有方法论的意义,是天人之间的过渡环节,但它们又不能被说成是纯粹的方法论,而是与人的存在问题密切相关的,其本身既是实践的,又是目的性的。最后,天人篇则是全部范畴体系的完成,即“天人合一”境界的实现,其中的诚、仁、乐代表了真、善、美,三者又是统一的。因此,整个范畴系统,最后以真、善、美统一的“天人合一”境界为其终结。这就是理学家们的共同诉求,没有例外,这也是理学范畴系统何以可能的原因和根据。